

## 赵复三的讲话

在这里我想谈三点意见：

第一，我们生活在大变革的时代中。

陆学艺同志在开幕词中讲到，现在是大变革的时代。周文华书记讲，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需要研究国际环境。这使我想到前不久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加尔布雷斯和苏联东欧国家《和平与社会主义》杂志主编缅什科夫两个人的对话记录。从对话记录看，当前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学者，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学者，都感到一个共同问题，认为需要重新估价自己的社会制度，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不仅在经济学界有这个趋势，在政治学界也有这个趋势。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罗波特·达尔1982年在《多元民主的困境》中分析了美国式的多元民主。认为由于相互牵制，多元民主成为社会改革中的保守机制。因为任何一部分权势集团都不愿意本身的利益受到损害，由于相互牵制，社会就很难改革。在社会学界，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丹尼尔·贝尔自60年代就提出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问题，进入80年代，柏克利加州大学的罗伯特·贝拉教授又对美国社会生活方式感到忧虑。去年秋在巴黎和法国社会学家哥德里谈话，他认为，尽管西方科学技术还在发展，但西方社会整个说来，处于停顿状态。美国研究国际关系的重要学者保罗·肯尼迪前不久发表一篇文章《美国的相对没落》，在美国引起了震动。近十几年来，在美国的学术界、思想界已不再有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那种乐观自信情绪了。

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中国、苏联、还是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深深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也需要重新估价过去，进行全面的改革。在世界范围内，可以看到，现在改革成为世界潮流。这个改革探索的过程看来至少要继续到2000年。能不能进行自身的改革，是衡量一个民族一种社会制度有没有活力的标志之一。也许可以说，当前世界正在进行一场改革发展的和平竞赛。世界进入一个大变革时代，我们过去100年的历史就是为今天参加这个竞赛作准备。我想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要联系当前的世界形势，把我们自己放到世界形势之中去。

第二，大变革时代需要我们重新研究中国社会。

前不久，我和美国一个研究中国政治的专家谈话，他认为：中国正处于一种大变革时代，单纯从政治结构、政策来理解中国的发展，已经不够了，需要到农村去，到中国社会基层去研究中国的变化了。这位美国学者的想法也给我们一些启发。过去我们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都是比较单一的。现在经济、社会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经济活动越来越复杂，经济体制越来越多样化，社会生活中起作用的有多种因素，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新的社会组织，取代了过去起作用的社会组织。全面改革是我国现阶段发展的历史必由之路。在社会学研究中，怎样牢牢抓住这些复杂的变化，来研究我们的改革，促我们前进，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大课题。推动这场改革，当然需要马列主义的思想指导。马列主义是从社会实践中概括出来的，到现在人们还未发现有其它思想体系比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能更有效地帮助我们全面认识社会和世界的变化发展，当然马列主义也还有待丰富和

发展。每一种思想体系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基础。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社会基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社会相结合，就是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中国的社会在变化发展，但有的理论认识也不能不发展。最近谈到去年10月，在华沙举行了一次波兰和苏联学者关于哲学与改革的学术讨论会，在讨论会上，一位波兰学者提出，过去的马克思主义有两个突出的缺点，其一，错误地认为已经认清了国家的全部现实；其二，对人的自身缺乏研究。波兰学者的这个意见，值得我们深思。我们的社会科学界，社会学界在科研、理论上是否应当补足这两个缺陷。费孝通先生在讲话中提到，苏共中央关于重视社会学，发挥社会学作用的决定，其中提出了对社会学的要求。第一，培养劳动人民的科学世界观；第二，配合实施苏联国家的政策；第三，希望社会学集中研究苏联最迫切的社会问题，充分发掘人的创造潜力。苏联对社会学的这种重视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借鉴的。

今年5月，在西安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讨论会。会上着重讨论了4个大的题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性质和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结构，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标准如何正确理解。发展生产力是衡量我们工作的根本标准，但有时容易被理解为唯一的标准，而怎样衡量生产力发展又容易被简单地用国民生产总值来计算，它掩盖了高成本、低效率问题，掩盖了产品质量和社会效益方面的问题，掩盖了生态环境被破坏的问题，掩盖了人的精神面貌问题。就经济来说，仅以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指标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一整套经济指标和相应的社会发展指标。在大量出现的社会问题面前，我们还要认真研究社会的组织、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为此要深入进行国情调查。国家的改革，离不开我们对国情的了解，因此，社会学研究和国家改革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第三，我相信，社会学研究是会繁荣，发展，前进的。

从客观条件看：第一，我们处于大变革的时代，十亿人自觉改造我们的国家，这个巨大的社会实验室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要研究世界其他国家的变革实践，吸取外国的经验。西方社会在发展中也面临一大堆社会问题，在解决社会问题过程中，创造出他们的一套理论。我们对待西方的经验要认真研究，同时也知道西方的理论容易受到的局限。对于苏联，对于东欧国家，对于其他发展中的国家，对他们的经验我们也抱同样的态度，吸取对我们有益的部分；第二，经过将近40年的反复实践，我们现在有了稳定的文化政策，有比较有利的科学研究环境；第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我们有理论联系实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我们的社会学研究，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研究社会学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朴实的、尊重科学的、尊重不同学派的学风来研究；第四，我们有团结协作的队伍和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我想，这是社会学研究能繁荣发展的保证。

除上述四条外，关于必要的物质支持，8月5日在北京召开全国社会科学规划小组会议，会议将讨论从社会科学基金中提取100万元作为国情调查的资助经费。国情调查，包括经济体制当中的问题，民主法制方面的问题，教育发展当中的问题，政治体制的问题等。社会学在国情调查中，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有上述的客观条件，还要我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运用并发展这些条件。这样，社会学的繁荣和发展就指日可待了。

谨祝我们这次会议在推动我国社会学发展上迈出新的步伐，祝会议成功。